

Korean War and Nuclear Weapons

朝鲜战争与核武器

★ 邵永灵 邱 军

摘要：朝鲜战争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进行的第一场大规模有限战争，尽管当时苏联已经打破了美国的核垄断，但美国仍然拥有压倒性的核优势。在将近3年的军事较量和停战谈判中，无论是对于美国军方还是行政当局，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都是一个巨大诱惑。面对气势如虹、坚忍不拔的中国人民和志愿军战士，美国既做好了实际使用核武器的准备，又对中国发出了旨在威慑与讹诈的核威胁。最终，美国没有在战争中使用核武器，核威胁也未达到其预期目的。但经此一战，核武器作为特殊武器、终极武器的地位得以巩固，中国也因为受到核威胁而更坚定了发展核武器的决心。

关键词：抗美援朝 核武器 核威胁

中图分类号：E19 K312.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4883-(2020)05-0024-07

朝鲜战争爆发于1950年6月。此时，不仅美苏都已拥有核武器，而且也是核武器开始大发展的时间节点。1950年1月，美国做出研发氢弹和战术核武器的决定。到1953年7月停战协定签署时，核武器就从昂贵而稀有的“高端武器”变成可以大量生产并种类繁多的“普通武器”。朝鲜战争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进行的第一场大规模有限战争，失去了核垄断的美国对苏联仍然拥有压倒性的核优势。在将近3年的军事较量和停战谈判中，无论是对于美国军方还是行政当局，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都是一个巨大诱惑。在战争中，面对气势如虹、坚忍不拔的中国人民和志愿军战士，美国既做好了实际使用核武器的准备，又对中国发出了旨在威慑与讹诈的核威胁。最终，美国没有在战争中使用核武器，核威胁也未达成其预期目的。但经此一役，核武器作为特殊武器、终极武器的地位得以巩固，中国也因为受到核威胁而更坚定了发展核武器的决心。

一、美国对核武器的运用：实战与威慑之间的张力

在朝鲜战争中，美国自始至终都在考虑使用核武器，但其对核武器的使用存在着内在张力。一方面，从总统到军方，确实准备将核武器用于实战，核武器被当作可以解决实际军事问题的普通武器；另一方面，他们又想利用核武器的巨大威力达成向对手施压、迫使对手屈服让步的目的，即将核武器作为进行威慑与讹诈的特殊武器。这两种运用核武器的方式在战争实践中根据具体情形的不同而分别或同时使用。但是，不同的运用方式之间常常发生冲突，反映了核武器的实战运用与威慑运用之间的内在张力。

（一）将核武器用于实战

美国准备将核武器用于实战主要基于两种需求：一是用核武器扭转战场上的不利态势。在这一背景下，核武器发挥的是普通武器的作用，可以看作是升级版的常规武器，仅仅用来加强美军的火力和摧毁力；二是在战争扩大或升级时，用核武器替代人力，以减少美军伤亡、缩短战争进程。

1950年10月下旬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后，美军接连遭到沉重打击。面对军事上的失败，美国

【作者简介】邵永灵，火箭军研究院党史军史研究中心研究员、博士研究生导师；邱军，火箭军研究院党史军史研究中心主任、副研究员。

国内出现强烈的要求动用核武器的呼声。11月30日总统杜鲁门在记者招待会上发出核威胁之后，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一个小组委员会开始制定将原子弹的管辖权由原子能委员会移交给军方的具体措施。已经处于高度警戒状态的战略空军司令部则被要求立即准备将中程轰炸机部署到远东。12月初，杜鲁门下令将分解的核弹头部件空运至远东储存在美国的1艘航空母舰上。^①

在军方人士中，麦克阿瑟是对使用核武器最积极的一位。受杜鲁门在记者会上表态的鼓舞，他于12月上旬向参谋长联席会议提出要求赋予他“使用原子武器的指挥官的判断力”。麦克阿瑟还提出一份包括了26个目标的对北朝鲜与中国进行核打击的名单，内含军事基地与工业中心。^②

1951年初，面对中朝军队的节节攻势与“联合国军”的全面败退，无计可施的杜鲁门一度想升级战争，即将战火烧到中国去。基于杜鲁门的思路，国家安全委员会于1951年1月通过了由国家安全资源委员会主席、前空军部长赛明顿起草的NSC-100号文件，将对中朝实施核打击列为美国国家战略的一环。麦克阿瑟也乘机在2月间搞出一个使用30—50颗原子弹轰炸中国东北空军机场与其他目标、彻底打败中国与北朝鲜军队的原子轰炸计划。^③

总的来看，从1950年底到1951年初，受到来自国内各方面的压力，美国对朝鲜或中国使用原子弹的倾向性很大。军方认为，只有原子弹才能在较短时间内对大范围的目标实施有效打击，从而对战争发挥决定性作用。

1951年3月中旬，美国情报部门获悉，中国在东北和华北地区集结了大量兵力，苏联也在中国东北和其远东海域进行了大规模兵力集结。美国军方担心中国试图在苏联空军的援助下发动最后攻势，将美军逐出朝鲜，甚至可能联手进攻日本。4月5日，参联会主席布雷德利建议向关岛和冲绳部署核武器。杜鲁门最终决定将第9轰炸机中队部署到关岛，在那里训练完毕后再调往冲绳，准备应对苏联对朝鲜或日本的攻击。4月9日，由战略空军副司令鲍威尔负责指挥的9架携带核弹头的B-50轰炸机受命飞往关岛安德森空军基地。5月，华盛顿授权“联合国军”新任司令李奇微，在遭遇来自朝鲜半岛以外的大规模空中攻击时，可以对中国东北和山东的空军基地实施核报复。为此，美军远东空军出动飞机到中国东北和华东地区进行空中侦察，寻找打击目标。^④

1951年7月停战谈判开始后，由于谈判进展不顺，以及在谈判过程中双方打打停停，美国方面又出现了使用原子弹的呼声，其间核手段始终是美国最高决策当局思考的一个重要政策选项。如果说此前考虑使用原子弹更多是针对中国本土和苏联的话，此时因为美国已经试验成功了用于战术目的的小型核武器，美国军方的研究重点更多放在了原子弹的战术使用上，希望在战场出现僵局的情况下用原子弹的杀伤力抵消共产党国家庞大的人力资源。1951年九十月间，美军远东司令部、战略空军司令部和太平洋舰队司令部在朝鲜联合进行了代号为“哈德逊港行动”的秘密军事演习，从冲绳起飞的B-29轰炸机将装有常规炸药的模拟战术核武器投掷到朝鲜，旨在研究核武器在战场上的实际效能。整个演习过程包括原子弹的装配、调试、导航、轰炸目标的地面控制乃至等待华盛顿的最高指令等，都严格按照实际核攻击方式进行。1951年11月至1952年初，美国又在本土和朝鲜接连进行了几次同样的模拟演习。^⑤

1953年1月艾森豪威尔就任美国总统。虽然他在竞选时宣称要打破朝鲜战场上的僵持局面，但实际上并无明确计划和具体行动方案。此时，中朝军队已经构筑了横跨整个半岛、犬牙交错的地下工事，又在纵深组织了牢固的阵地，武器装备也得到极大改善，并在人数上占有绝对优势。显然，使用常规手段向前推进是“最不诱人的方案”。为避免使进攻付出过分高昂的代价，美国政府意图借助核武器，甚至

① 赵学功：《核武器与美国对朝鲜战争的政策》，《历史研究》2006年第1期。

② 江峡：《论冷战时期美国对中国的核讹诈与核威胁》，《湖北行政学院学报》2014年第4期。

③ 江峡：《论冷战时期美国对中国的核讹诈与核威胁》，《湖北行政学院学报》2014年第4期。

④ 赵学功：《核武器与美国对朝鲜战争的政策》，《历史研究》2006年第1期。

⑤ 赵学功：《核武器与美国对朝鲜战争的政策》，《历史研究》2006年第1期。

把战争扩大到中国境内。国务院和军方加紧制定各种结束战争的计划和行动方案，从中可以看出美国领导人扩大战争、动用核武器的倾向在明显增强。不过，在朝鲜找到合适的核打击目标并不容易，最终，艾森豪威尔使用核武器的念头仅仅停留在讨论阶段。

通常来说，一种新武器，尤其是像核武器这种被寄予厚望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其实战运用必须严格保密，因为只有在对手毫无防范时，才能收到突然袭击的效果。所以，美国方面对于实际使用核武器的想法和准备一直秘而不宣，除了怕中国和苏联做好防御准备外，也担心苏联利用这一机会提高自己的核武器水平。

（二）将核武器用于威慑

尽管在核武器问世初期人们对其定位仍然是武器，但透过广岛、长崎的核爆，核武器巨大的威慑效应已经显现出来。因此，利用人们对核武器的恐惧以达成政治军事目的就成为美国在朝鲜战争中的重要考虑。

美国对核武器的威慑运用主要体现了三个方面的意图。

首先是阻止中国参战。1950年7月底，由于朝鲜战局对美国极其不利，美参联会决定由战略空军司令部为远东空军增加两个可以携带原子弹的B-29轰炸机中队，旨在加强对朝鲜的常规轰炸能力。杜鲁门同意把装有非核部件的10架B-29轰炸机部署到关岛。《纽约时报》公开报道了这次部署情况。杜鲁门此举除了避免在朝鲜的军事失败外，也含有威慑中国的意味，以此阻止中国出兵朝鲜或解放台湾。^①

其次是迫使中国停止军事行动。1950年11月间，美军在第二次战役中损失惨重，杜鲁门这时开始公开对中国发出核威胁。在11月30日新闻记者会上，杜鲁门警告说：“我们将采取任何必要的步骤，以应付军事形势。”当有记者问那是不是包括使用原子弹时，杜鲁门回答说：“包括我们所有的各种武器。”他表示：“我们一直在积极地考虑使用它。我不希望有朝一日使用到它。它是一种可怕的武器，不应该用来对付无辜的男人、妇女和儿童，他们和军事侵略无关。可是原子弹一经使用，这种情况就无法避免了。”记者招待会之后，杜鲁门又授权新闻秘书发表了一项声明，里面提到：“按照法律，只有总统有权批准使用原子弹……如果到了该发布这种命令的时候，他将授权战区军事司令官负责战术上投送这种武器的任务。”^②这是美国总统首次公开宣称在积极考虑对中国使用核武器，并暗示什么时候使用原子弹将由朝鲜战场的军事指挥官麦克阿瑟决定。

1951年4月，在第五次战役前夕，华盛顿派国务院政策规划委员会官员查尔斯·马歇尔秘密前往香港，通过传话人向中国发出威胁，称中国领导人不要错误地把美国政府拒绝扩大战争的行动看作是软弱和胆怯的信号，美国的忍耐和克制是有限度的，中国应该很清楚，华盛顿有能力使中国的发展倒退几十年。^③这是赤裸裸地对中国进行核威胁。

第三是推动中国接受美国的停战条件，早日结束战争。艾森豪威尔在竞选时就宣称上台后立即结束朝鲜战争，为此考虑使用核武器。1952年12月14日，尚未就任的艾森豪威尔在访问朝鲜后公开许诺，从今以后，美方将用“在我们自己选择的条件下采取”的行动给敌人留下深刻的印象。^④此话显然是说给中国听的。艾森豪威尔和国务卿杜勒斯都认为，明显表示随时准备使用核武器将增加达成能接受的停战协议的可能性。

1953年5月21日，杜勒斯在访问印度时与印度总理尼赫鲁谈到了在“可能超过冲突范围外”采取更“强硬”军事行动的可能性。^⑤杜勒斯认为，尼赫鲁会将美国隐含的使用核武器的警告透露给中国，即如果继续战争将招致毁灭性的核打击。

① 赵学功：《核武器与美国对朝鲜战争的政策》，《历史研究》2006年第1期。

② 哈里·杜鲁门：《杜鲁门回忆录》下卷，北京：东方出版社，2007年，第497～498页。

③ 赵学功：《核武器与美国对朝鲜战争的政策》，《历史研究》2006年第1期。

④ 麦乔治·邦迪：《美国核战略》，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1年，第330页。

⑤ 麦乔治·邦迪：《美国核战略》，第335页。

威慑的成功需要令对手知晓自己的实力和决心,从而达到劝阻或威逼的目的。所以,在对中国进行核威慑的过程中,美国采取了上述各种公开或半公开或秘密传话的方式,旨在让中国了解自己的意图,影响中国的决策。显然,这与准备在实战中使用核武器是完全不同的。不过,将实战与威慑完全区分开来并不容易,无论是杜鲁门时期还是艾森豪威尔时期,常常在准备使用核武器的时候又想用核武器进行威胁和讹诈,其行为表现纠结于秘密准备与公开威胁之间,这与后来核武器专门用于威慑明显不同。

二、美国在朝鲜战争中未能使用核武器的原因

如果说二战之后哪一场战争最接近使用核武器,那么非朝鲜战争莫属。在这场战争中,后来已经渐渐固化、对使用核武器构成最大阻碍的核禁忌^①尚未形成,人们对核武器的看法还摇摆于普通武器与绝对武器之间。美国著名学者伯纳德·布罗迪认为,“我们在朝鲜不使用原子弹似乎有三大原因。第一,三军参谋长认为,朝鲜战争基本上是苏联的一种佯攻或声东击西的手法,因此我们就有一种强烈的动机,企图把当时数量还比较少的核武器节省下来以便在大显身手时使用。第二,战区指挥官不断报告,认为朝鲜战争中没有使用核武器的适当目标……第三,我们的盟国,特别是英国极力反对我们使用核武器。”^②总的来看,美国在战争中没有使用核武器有相当程度的偶然性,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形势的变化,未使用的原因也不尽相同。我们可以从军事、战略、政治三个角度来分析这一结果。

(一) 从军事角度看,美国未使用核武器是因为朝鲜缺少合适目标

原子弹作为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显然不能用于无足轻重的场合,尤其考虑到战争初期核武器尚处于稀缺状态。所以,通常认为,原子弹主要对付的目标是军队集结、炮兵阵地、机场港口等,但是由于朝鲜复杂多山的地形、中朝军队武器装备的相对落后、朝鲜社会经济的不发达,类似目标在朝鲜很难找到。到了停战谈判开始之后,中朝军队与“联合国军”在三八线附近形成了军事上的僵持局面,中朝军队深挖防空洞、广筑地下工事,原子弹的威力同样难以发挥。当时美国在内华达州进行的核试验表明,核爆冲击波对足够深的地下影响很小。

问题不仅是对朝鲜使用原子弹在军事上意义不大,而且如果原子弹在朝鲜使用而没有发挥决定性作用,将对美国的威慑战略产生不良影响。国务院政策设计室主任保罗·尼采强调,如果使用了原子弹而不能产生理想的结果,那将大大降低美国现存核武器的威慑力。^③而核武器威慑力的降低势必会显著影响那些期望得到美国保护的西欧国家的信心。对于常规力量远不如苏联的北约而言,核武器是其军事战略的支柱。

(二) 从战略角度看,美国未使用核武器反映了美国的战略重点在欧洲而非亚洲(远东)

美国介入朝鲜战争的一个重要理由是,这是以苏联为首的共产主义集团在全世界发动进攻的试探,必须坚决顶回去。在朝鲜战争爆发后从密苏里州独立城返回华盛顿的飞机上,杜鲁门这样表述自己当时的心情:“在我们这个年代,强者向弱者进攻,这并不是第一次……我记得每当民主政治没有能发挥作用的时候,就会怎样助长侵略者的气焰。共产党人在朝鲜的所作所为,就同希特勒、墨索里尼和日本人在十年、十五年和二十年前的所作所为一样。我深切地感觉到,如果听任南朝鲜沦丧,那么共产党的领袖们就会越发狂妄地向更靠近我们海岸的国家进行侵略……如果对这种侵略行动不加以制止,那就会爆

^① 核禁忌理论认为,即使核进攻有助于本国获得现实的利益,核武器国家也难以做出核进攻的决定。不使用核武器是一种强烈的禁止性的规范(prohibitive norm)。这种强烈的禁止性的规范又被称为禁忌。参见李彬:《中国核战略辨析》,《世界经济与政治》2006年第9期。

^② 伯纳德·布罗迪:《导弹时代的战略》,军事科学院外军研究部译,北京: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出版部,1961年,第340~341页。

^③ 赵学功:《核武器与美国对朝鲜战争的政策》,《历史研究》2006年第1期。

发第三次世界大战，正如由于类似的事件而引起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一样。”^①

但是，美国介入朝鲜战争后并没有因此而改变自己的战略重点。美国决策者认为，其真正的敌人还是苏联，“自由世界”不能因为与苏联卫星国在众多分散的地点四处作战消耗掉自己的实力，同时让苏联毫发无损。^②所以，美国不能将自己的资源全部用在朝鲜战场。朝鲜战争第一年美军方反对使用原子弹的主要原因就是宝贵的原子弹应该用来遏阻苏联对欧洲的进攻。

事实上，美国的盟友们反对美国在朝鲜使用核武器也是基于上述理由。在杜鲁门声称美国正在积极考虑使用原子弹 96 小时后，英国首相艾德礼抵达美国。在艾德礼看来，美国决定和中共大干一场将会削弱美国本可以用在欧洲的力量，欧洲人也不愿意在朝鲜冒第三次世界大战的风险，或者过多地把北约组织所属的有限力量投入遥远的亚洲半岛上去打“消耗战”。艾德礼动身前与法国总理和外长进行过会谈，这说明艾德礼代表的不仅是英国，还有西欧。^③当时在野的英国前首相丘吉尔也持相同立场。他说：“（苏联）计划显然是尽力促使美国 and 联合国深陷在中国，这样可以阻止欧洲防御力量的增加，使之不能成为有效的威慑力量。声东击西，这是人人皆知的战略和战术方法，几乎已经用滥了……虽则远东对我们牵制很大，但毕竟只是个牵制而已。我们应当稳定那里的局势，越快越好……因为决定世界命运的地方是欧洲……致命的危险也在这里。”^④

到了朝鲜战争后期，虽然核武器不再稀缺，但美国的战略重点决定了其不可能在远东进行一场大战，而如果用核武器打击中国本土目标，则很可能导致苏联参战和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毕竟中苏已经签署了友好同盟互助条约。

（三）从政治角度看，美国未使用核武器是担心世界舆论对自己不利

不管美国如何强调核武器是普通武器，从战后国际社会对核武器进行控制的积极探索、美国国内对发展“超级炸弹”（氢弹）的争论、美国自身在是否使用核武器问题上的犹豫不决、患得患失就可以看出，核武器不是普通武器，而是一种一经使用就会造成滥杀超杀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所以，美国担心对中朝使用核武器会引起亚洲国家和人民的反对，特别是轰炸中国东北大城市势必会杀伤大量无辜平民，以致遭到盟友和世界舆论的强烈谴责。1952 年 12 月，麦克阿瑟提出一套解决朝鲜冲突的方案，其核心仍然是使用核武器。对此，艾森豪威尔表示：“我必须考虑我们和盟国对进行这场战争的谅解，因为如果我们要轰炸鸭绿江那一边的基地，如果我们要扩大战争，我们必须肯定不会冒犯全世界人民。”^⑤1953 年 2 月 11 日在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上，艾森豪威尔表示，应该考虑在开城地区使用战术原子武器。布雷德利认为，即使向盟国提及这一可能性也将是不明智的。艾森豪威尔最后排除了与盟国讨论军事计划和进攻所使用的武器的任何可能性。^⑥

三、抗美援朝战争中核武器因素对中国的影响

显然，美国无论是想实际使用核武器还是运用核威慑与核讹诈，中国都是其目标。而且，即使美国在核武器问题上不做任何动作和表态，也掩盖不了美国近乎拥有核垄断的事实。如果说核武器“存在即威慑”，那么美国对中国形成核威慑似乎是一个客观事实。但是，从中国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的决策和行动来看，美国的核威慑并未对中国产生明显可见的影响力。

① 哈里·杜鲁门：《杜鲁门回忆录》下卷，第 416 页。

② 石斌：《保罗·尼采：核时代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缔造者》，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 年，第 104 页。

③ 约翰·斯帕尼尔：《杜鲁门与麦克阿瑟的冲突和朝鲜战争》，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 年，第 178～179 页。

④ 约翰·斯帕尼尔：《杜鲁门与麦克阿瑟的冲突和朝鲜战争》，第 179～180 页。

⑤ 赵学功：《核武器与美国对朝鲜战争的政策》，《历史研究》2006 年第 1 期。

⑥ 麦乔治·邦迪：《美国核战略》，第 333 页。

（一）中国在出兵抗美援朝之前已经考虑到了美国可能使用原子弹

核武器因素是中国做出抗美援朝决定时必须面对的客观现实。早在1950年8月5日，毛泽东在接见战略预备队第13兵团司令员邓华时就强调：“你们集结东北后的任务是保卫东北边防，但要准备同美国人打仗，要准备打前所未有的大仗，还要准备他打原子弹。他打原子弹，我们打手榴弹，抓住他的弱点，跟着他，最后打败他。”^①1个月以后，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九次会议上再次强调：“对战争打起来的时候，不是小打而是大打，不是短打而是长打，不是普通的打而是打原子弹，我们要有充分准备。你如果一定要那样干，我们就跟上来。”^②正因为已经预料到美国可能使用核武器，所以中国对美国的核威胁、核讹诈既不意外也不惊慌，并没有因此而影响自己的战略部署和军事行动。

那么，中国当时有什么底气忽略美国的核武器因素、毅然决定出兵抗美援朝呢？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一是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大无畏的革命精神，这一精神是在战争年代历经血与火的考验形成的。即使美国没有原子弹，一个新生的弱国与世界头号军事强国较量也需要非同寻常的勇气。二是当时中苏签署了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苏联作为中国的盟友，不仅拥有强大的常规力量，还打破了美国的核垄断，在某种程度上形成了对中国的核保护，使美国对中国动用核武器的决策变得困难和复杂起来，美国必须要考虑到苏联可能的核报复，虽然这一报复能力较为有限。

（二）美国的核威胁未影响中国在朝鲜的军事行动计划

1950年夏天，美国公开了在关岛部署B-29战略轰炸机的消息，想以此施加压力，阻止中国出兵朝鲜，但最终并没有改变中国领导人抗美援朝的决心。

1950年12月，中国人民志愿军与朝鲜军队在杜鲁门发出核威胁后不久即发起猛烈的新年攻势，并在1951年1月4日占领汉城，迫使美军继续向南败退。

在第五次战役之前，美国通过传话人对中国进行了核威胁，但中国人民志愿军依然按照预定计划发起了第五次战役。这是志愿军入朝参战以来发动的规模最大的一次军事进攻，最终将战线稳定在三八线地区，迫使“联合国军”转入战略防御，并接受停战谈判。

艾森豪威尔上台后，面对其赤裸裸的核威胁政策，中国做出了将战争继续下去的表态。1953年1月23日，《人民日报》在社论中提到了对美国可能动用原子弹的预计。5月21日，杜勒斯在印度对中国发出核威胁，志愿军却在6天后再次发起了攻势，并在战场上取得了丰硕战果。

虽然从杜鲁门到艾森豪威尔都希望通过威胁使用核武器影响中国的军事决策，但从实际情况看并未收到此种效果。

（三）中国在战俘问题上松动立场早于美国的核威胁

无论是当时还是后来，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都始终认为，他们通过间接方式透露的准备使用核武器的信息得到了中国领导人重视。艾森豪威尔后来对他的助手谢尔曼·亚当斯说，是“原子战的危险”导致了7月的协议。“我们对他们说，如果共产党不履行停战协议，我们再不能坚持有限战争了。他们也不希望一场全面战争或是原子突击。这使他们有所收敛。”杜勒斯表示：“我们之所以能赢得停战的主要原因是因为我们准备打更激烈的战争，我们已向战场送去投掷原子弹的装置……中国共产党通过他们良好的情报系统了解了这一情况，实际上，我们极愿意他们知道。”^③

但事实并非如此。早在美国发出核威胁之前，中国就于1953年3月30日和5月7日先后在战俘遣返问题上主动做出较大让步，而战俘问题是停战谈判久拖不决的重要原因。很多学者都认为，中方在战俘问题上松动立场与斯大林去世有直接关系。从停战谈判一开始，苏联和中国就保持着紧密的沟通与协商，双方电报往来极其频繁。在1952年下半年板门店停战谈判陷入僵局之际，毛泽东主张将战争继续下去，

① 崔茂东、李华：《毛泽东论核武器与核战争初析》，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8年，第31页。

② 崔茂东、李华：《毛泽东论核武器与核战争初析》，第32页。

③ 麦乔治·邦迪：《美国核战略》，第329～330页。

在和平谈判问题上坚决不能让步，但朝鲜方面希望接受美国的停战条件，尽快在停战谈判协定上签字。最终，斯大林支持了毛泽东的立场。^①1953年3月5日斯大林去世前3天，苏联外长莫洛托夫还表示：没有任何朝鲜停战协定会被接受，除非按照共产党的条件。^②斯大林去世后，苏联新领导人的对外政策发生了变化，趋向让步和缓和的方针占了上风。尽管毛泽东对此仍然坚持强硬立场，但他还是听从了苏联的意见，步履维艰的板门店谈判终于有了结果。^③总之，不管中国态度转变到底基于什么理由，这一转变都发生在美国核威胁发出之前。

（四）美国的核威胁与核讹诈坚定了中国发展核武器的决心

令美国始料未及的是，正是朝鲜战争和随后两次台海危机中美国对中国的核威胁与核讹诈，推动中国走上了发展核武器的道路。

毛泽东作为那一时代最具战略眼光的领导人，决心发展核武器有其必然性。但是，没有技术来源，国家财力有限，再加上战争环境等原因，中国政府原本决定在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年）中不列入研制核武器的准备措施。^④但是中国研发核武器的时间表很快提速，这显然与毛泽东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受到的核威胁有关。1954年10月18日，在国防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毛泽东在讲话中提到，“帝国主义估量你只有那么一点东西，就来欺负我们。他们说‘你有几颗原子弹？’”^⑤这是毛泽东第一次提出没有原子弹就要受人欺负。这里的“欺负”主要是指帝国主义用手里的原子弹进行核威胁与核讹诈。毛泽东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对此有切身感受和切肤之痛。此后，他多次提到这一观点。

毛泽东在公开场合首次透露发展原子弹的打算是在1954年10月23日与印度总理尼赫鲁的谈话中。毛泽东谈到了原子弹与核战争，还有意向对方透露了一个重要信息：“我们正在开始研究，原子弹是要花本钱的，我们一下子还搞不起来。”^⑥最终，1955年1月15日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做出了建立和发展中国原子能事业、研制核武器的决定。^⑦研究冷战与中国核武器发展计划的中外学者大都认为，美国对中国的核讹诈与核威胁，是促使仍旧贫穷落后的新中国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坚持发展自己的核武器的关键因素。1964年10月16日，中国政府在首颗原子弹试爆成功后发表声明，指出了中国首次核试验的重大意义与目的：“中国核试验成功，是中国人民加强国防、保卫祖国的重大成就，也是中国人民对于保卫世界和平事业的重大贡献”；“面临着日益增长的美国的核威胁，中国不能坐视不动。中国进行核试验，发展核武器，是被迫而为的。”^⑧

[责任编辑：杨 涓]

-
- ① 沈志华主编：《中苏关系史纲》（上），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177页。
 - ② 诺曼·里奇：《大国外交：从第一次世界大战至今》，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284页。
 - ③ 沈志华主编：《中苏关系史纲》（上），第186页。
 - ④ 沈志华主编：《中苏关系史纲》（上），第231页。
 - ⑤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6卷，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18年，第359页。
 - ⑥ 崔茂东、李华：《毛泽东论核武器与核战争初析》，第49页。
 - ⑦ 崔茂东、李华：《毛泽东论核武器与核战争初析》，第56页。
 - ⑧ 聂文婷：《中国第一颗原子弹成功试爆后的对外宣示与国际反响》，《当代中国史研究》2014年第2期。